

2013 年度

文艺评论工程项目

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 编

文艺
评论
文选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2013年度

文艺评论工程项目

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 编

文艺
评论
文选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艺评论文选. 2013 年度/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编.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4. 2
(文艺评论工程项目)
ISBN 978-7-5154-0422-6

I. ①文… II. ①中… III. ①文艺评论—中国—文集
IV. ①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34455 号



CHINA LITERATURE
AND ART FOUNDATION

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

中国文学艺术发展专项基金

资助项目

出 版 人 周一
策划编辑 胡志华
责任编辑 胡志华
责任校对 康 莹
装帧设计 志 远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 ddzgcb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 辑 部 (010)66572264 66572132 66572154 66572434
市 场 部 (010)66572281 或 66572155/56/57/58/59 转
印 刷 北京铭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8.75 印张 2 插页 297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 (010)66572159 转出版部。

| 目录 |

李 准 | 新的精神发现与艺术提炼

——我看电视剧《寻路》 / 001

仲呈祥 | 文艺批评：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 005

陈晓明 | “在地性”与越界

——莫言小说创作的特质和意义 / 018

尹 鸿 | 人人爱国家与国家爱人人 / 046

郑晓华 | 学院派书法

——书法画：土壤、动机、愿景 / 049

张 法 | “文学”一词在现代汉语中如此定型是错的？！

——兼论中西文学的体系差异 / 057

周 星 | 电影艺术“中国梦”的正能量呈现 / 074

边国立 | 《国家命运》：精神的胜利 / 085

刘玉琴 | 报纸副刊：价值引领与文化担当 / 089

梁鸿鹰 | 文学的变与不变

——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一次讲座 / 093

饶曙光 | 新挑战与新机遇

——2012中国电影大变局 / 110

崔伟 | 体现时代特征 塑造魅力性格 / 122

张德祥 | 对“书法热”乱象丛生的思考 / 125

傅谨 | 戏曲表演理论体系刍议

——在“中国戏剧(戏曲)表导演体系论坛”上的发言 / 129

陈晓云 | 明星消费机制建构与中国电影产业发展 / 138

朱辉军 | 文艺与核心价值观的互动 / 148

彭利铭 | 无伤大雅“风水画” / 153

钱念孙 | 书画名家的“债务” / 157

赖大仁 | 当代文论研究:反思、调整与深化 / 162

王凤胜 | 难得的真实记录 / 177

蒋述卓 | 流行文艺与主流价值观关系初议 / 180

容本镇 | 矗立在历史深处的艺术丰碑

——“广西近现代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

作品述评 / 191

李少君 | 当代诗歌的“地方性” / 199

李震 | 关于《带灯》及贾平凹小说的几个问题 / 206

杨世君 | 西藏陶器

——火与土的艺术新生 / 215

侯仰军 | 不仅仅是对土地的礼赞

——厉彦林散文《土地,土地……》读后 / 220

郭云鹏 | 纵览第九届全国杂技比赛

——每个获奖节目都胜在“创新”上 / 223

赵 彤 | 久违了，田字格

——我看《中国汉字听写大会》 / 227

尚 辉 | 宏大叙事诠释民族复兴的审美理想

——十艺节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对于激越人文情怀的抒发 / 232

杜晓青 | 寻找民族独特的肢体表达

——第九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古典舞评奖综述 / 238

朱培尔 | “技进乎道”：一个未竟的使命 / 244

楚小庆 | 艺术学理论的核心作用是引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方向 / 248

胡晓军 | 审慎地面对两重“历史”

——从昆剧《景阳钟变》看历史题材古典戏曲文本的当代创编 / 264

施晓静 | 拓宽新农村少儿舞蹈美育工作的发展路径 / 270

王晓莉 | 他的宗教是写作

——记诗人李耕 / 274

蔡 雯 | 自信而优雅的转型

——读海男长诗《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出缅记》 / 280

李 珩 | 从生活到艺术

——胡采百年诞辰的追忆 / 293

李准 | 新的精神发现与艺术提炼 ——我看电视剧《寻路》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每当重大历史转折关头都要面临走什么道路的选择。道路的探寻关乎全局，关乎民族和国家的命运。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我国无数仁人志士为寻找民族复兴的具体道路前仆后继，历经曲折。中国共产党人历尽千难万险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更是揭开了真正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崭新篇章，道路探寻中凝成的宝贵经验至今仍是启迪和激励我们的巨大精神力量。

长篇电视连续剧《寻路》就是这寻路之旅和寻路精神的最新审美呈现。30年来，对于毛泽东及其战友从秋收起义到中央苏区“反围剿”的寻路历程，虽已有多部重大题材影视剧作出过各有侧重的艺术再现，但这次《寻路》的播出还是给人以强烈的新鲜感和精神震撼。原因在哪里？或者说，《寻路》在相近题材创作中的最大突破是什么？我以为，根本原因是该剧创作者自觉站在当代思维的高度对寻路之旅作出了新的精神发现与艺术概括，更有力地激发了历史经验与时代需求的共鸣。

一、不是一般地再现大革命失败后的寻路历程，而是紧紧抓住能否突破国际共运已有的具体革命经验这个争论的焦点，以一种更宏大的历史尺度去重新审视、发现“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探寻的无比艰难和巨大意义，从哲学的思想方法论层次上打通了历史与现实的内在精神联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人民当家的国家政权，这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原理，也是各国共产党

人共同的革命目标。但怎样实现这一目标呢,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走的都是中心城市暴动之路,国际共运史上只有这一种具体经验。中共在寻路中应如何对待这种经验?这是问题的要害之所在。《寻路》的高明就在于它通过真实地再现历史,集中而又尖锐地揭示出:那些从莫斯科和法国回到上海的中共领导人为什么长期抱着中心城市暴动的做法不放?为什么在“八一”起义失败之后又发动广州起义,接着又命令朱毛红军去打长沙打南昌打武汉,这些都失败后,他们自己又要到上海和南京搞暴动?除了他们对中国的实际缺乏深入了解,更深刻的原因是思想方法上的教条主义,把只适用于某些欧洲国家的经验当成了绝对律令。毛泽东为什么能独立提出和坚持“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当然与他对中国社会有深入认识并长期从事农民运动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他在方法论上坚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本本主义。正因如此,“农村包围城市”的探寻不仅给中国革命带来希望,也给国际共运开创了新的经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一部《寻路》生动地告诉观众:“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探寻实际上是中国革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而思想解放的要义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推而言之,不论是搞革命还是搞建设,中国的发展道路只能由中国人自己在中国的实践中去探寻和创造。外国的经验再好,也只能借鉴而不能照搬。不管是谁,背离了这一条,就要走弯路,就要吃苦头。

二、由于始终立足于中国革命之路的探寻是世界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创举的视点,该片不仅没有回避一些领袖人物在寻路中的缺点和错误、重要领袖人物之间的分歧和碰撞,反而通过对这些缺点和错误、矛盾和冲突的真实而智慧的描写,对寻路之旅即中国共产党人成长之旅的内涵和重要领袖人物伟大人格魅力的形成都作出了新的发现。比如,第一次用平行蒙太奇的叙事,交替地系统再现同样英勇的中心城市暴动的一次又一次失败和以农村为根据地斗争的节节胜利,在不断地对比中揭示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强大生命力。特别是接近结尾处的对比,一方面是中央苏区三次“反围剿”的巨大胜利,另一方面是指挥攻打大城市的党中央机关自己在上海再也无法立足,要分批到中央苏区的农村根据地来,更有力地反衬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又如毛泽东与朱德和陈毅在建军思想上的分歧和他在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落选、苏区中央局对毛泽东的错误批判尤其是在宁都会议上撤掉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这一直是重大题材创作中的难点,许多作品常常是绕道走或用画外音一带而过。《寻路》却迎难而上,由于把握住了共同革命目标下的认识分歧这个冲突本质,它直

面矛盾的形象描写不仅揭秘了历史，而且把难点变成了深化主题和塑造革命领袖形象的亮点。正因视点高超，又有直面历史的勇气和智慧，全剧精彩地写出了是艰难曲折又充满矛盾冲突的寻路历程把毛泽东从一个小学教员、农讲所所长塑造成具有非凡胆识和挑战性格的革命的政治与军事战略家，把周恩来从一个热血的青年革命家锻造成具有“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的博大胸襟的革命领袖，把朱德从一个旧军队的起义将领推上了中国工农红军统帅的位置，给观众呈现了更有新鲜感又更接近历史本来面貌的红军时期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艺术形象。

三、寻路之旅充满未知与艰险，中国革命道路的探寻除了正确的思想路线还必须以真正的革命信仰的坚守为支撑，前进的路是用先行者的鲜血和生命铺成的。《寻路》是又一个突出成就，是通过对党员队伍尤其是高层领导中革命烈士和叛徒形象的成功刻画，对坚守革命信仰的无比重要性及其巨大精神力量作出了新的深度发掘。在红军和农村根据地方面，被具体描写到的烈士有卢德铭、王尔琢、黄公略、宛希先、王兴业等，叛徒有余洒度、苏先俊、袁崇全、陈皓、龚楚等；在上海和其他大城市方面，被具体描写到的烈士有蔡和森、罗亦农、恽代英、赵世炎、彭湃、杨殷、杨匏安、张太雷、郭亮、陈延年、陈乔年、周方雍和陈铁军等，叛徒有何家兴、贺稚华、白鑫、唐虞、尤崇新、张克云、顾顺章、向忠发等。在重大题材影视剧创作中，第一次有一部作品集中写了党员队伍包括高层领导中这么多的烈士和叛徒，而且写得如此真实又令人震撼。因为把能够为实现人民解放的革命目标而献身视为最高荣耀，周文雍和陈铁军毅然宣布在敌人的刑场上举行婚礼，让敌人的枪声作自己婚姻的礼炮！因为视革命信仰的坚守、革命道路的寻找高过自己的生命，蔡和森被敌人用五个大铁钉钉在墙上时还大声怒斥叛徒，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相反，因为追求腐朽生活方式，革命信仰丧失，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前就已给蒋介石写好了效忠信准备着，叛变后成了捕杀共产党人的恶魔！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后，敌人尚未用刑，他就立即出卖党的机密以求饶，并领人去抓捕曾多次保护过他的周恩来！坚守革命信仰，虽死犹生；当了叛徒，虽生犹死。剧中这一幕幕历史的真实再现，这一次次崇高与卑鄙的强烈对比，在艺术感染力上产生了一种穿越时空的叠加效应，教观众不仅会重新审视、发现革命信仰的崇高意味，而且自然会联想到今天我们坚守共同富裕的美好信仰对于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何等的重要。

与思想内容上的这些新发掘相呼应，该片二度创作中起用有潜质的青年演员饰演毛泽东和其他领袖，加快台词、动作和整个叙事节奏，也都给史诗品格的追求带来了新的气象。局部的遗憾是有的次要演员的形象、表演上与角色要求尚有差距，某些情节的戏剧化程度还不够高。当然，这也给今后进一步精益求精留下了空间。

作者系中国文联原副主席

本文原载于2013年7月9日《人民日报》

仲呈祥 | 文艺批评：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文艺批评要“为人民立言”

为生活写真，为人民立言，是文艺批评的核心价值所在，也是我从事文艺批评 30 多年领悟出的一个道理。懂得了这个道理，我就有了坚守文艺批评领域的信心和动力。文艺是满足人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和人格品质的一门“学问”。坚持以人为本，把满足人、服务人、提升人当作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文艺创作的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愈文明，社会愈进步，人对世界的把握就理应愈全面、愈完整、愈和谐、愈科学。其间，既有经济的、政治的、宗教的、哲学的、历史的等多种方式的把握，也必不可少地需要有艺术的即审美方式的把握。文艺创作与鉴赏就是以独特的审美方式去把握世界、反映世界，去作用于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

与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一样，文艺批评也要为人民服务，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历史观所决定的。70 年前《讲话》对于文艺批评也要“为人民”的回答，至今掷地有声。“为人民”的文艺批评，要求批评家在行动上成为对人民负责任的批评家，要求批评家自觉地深入生活以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从而做到以科学的文艺批评，去培养高雅、文明、幽默、机智的审美创作与鉴赏群体，同时抵制以庸俗的市俗的文艺批评，去造就浮躁、平庸、浅薄、低俗的社会文化氛围。

时至今日,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议,与《讲话》精神一脉相承,充分表达了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自觉、自信与自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人类发展的历史,尤其是当代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在和平时期,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区与地区的竞争,归根到底是文化软实力的竞争。在现阶段,强调要高度的文化自觉,就是因为某些地方、某些人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上不那么自觉,比较盲目;强调要高度的文化自信,就是因为有的人对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不那么自信,甚至于自卑;强调着眼于提高民族精神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的文化自强,就是因为有的地方与部门工作的着眼点只在GDP上。

文化是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完整意义上的人,一方面是为一定的文化所塑造的人,另一方面又是创造有别于传统文化的新文化的人。在宇宙间地球上,惟有人,才能创造文化。“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下者,乃人之天下。所以,文化也是用来化人的。文化的第一要义,就是要营造氛围,一种启迪智慧、熏陶灵魂、提升素质的氛围。毋庸置疑,这些年的文化氛围被功利浸染得很厉害。人的道德滑坡、精神恍惚,都是文化氛围出了问题。

经济只能致富,文化方能致强。文艺批评与文艺作品应该携手营造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文化氛围,使每个人都能深入其间,感受到心灵的洗涤、灵魂的升华。这种氛围体现着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文明水准,这种氛围涵养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软实力,能够将精神藏富于民,成为抵御各种风险的不竭动力和智慧源泉。文艺作品不仅可以激发人的创造性思维,而且可以培养善良的人性、美好的情感。在文艺创作和鉴赏上,不能从过去一度把艺术简单地从属于政治、以政治思维取代艺术思维去把握世界的“形而上学猖獗”的极端,走向把艺术笼统地从属于经济、以利润思维取代艺术思维去把握世界的“形而下学泛滥”的另一极端。长期以来,我们在文艺领域吃了不少非此即彼的单向思维的亏。比如,在电影界就有一种倾向,一说主旋律就是拿政府奖的,不计成本,不考虑有没有艺术感染力;一说商业片就是赚钱的,想着如何去打“擦边球”,不考虑提升民族精神素质。这类现象深刻地启示我们,自觉坚持全面、辩证、发展的思维,坚持有思想的艺术与有艺术的思想的和谐统一,才能创造出具有较高思想品位、文化意蕴和审美情趣的文艺作品,才能有力推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局面的出现。我们必须谨记,一切文艺作品的灵魂,最后都是通过

视听感官和阅读神经的快感进而达于心灵、思想深处，并化为受众的精神美感。

国家在新形势下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倡导文化大发展、艺术大繁荣，落实在文艺批评战线的具体表现，就应该是高度重视“为人民立言”的批评宗旨，凝聚民族精神和民族力量，走向文化自强。对于今天的文艺界而言，文化自觉就是要自觉认识文艺化人养心的独特功能，自觉把握文艺创作与批评不从属于经济思维和工具理性思维的独特规律，自觉践行文艺不可逃避的历史责任和时代担当；文化自信就是自信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红色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永存的魅力，自信世界先进文明中适合中国国情民情的东西能够为我所用，自信与时俱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文艺创作与鉴赏的一元化主导作用。我们也拥护创新，也主张创新，但要在捍卫这些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大厦的根根支柱的同时，顺势方向去丰富深化发展，而反对逆势方向去颠覆拆卸解构。

文化氛围出了问题，文艺批评界是有责任的。检视我国市场经济进程中的文艺批评，其滞后于创作、不很健康的现状，不仅是人民群众，就连作家、艺术家和批评家在内，都颇有微词——有的批评趋时媚俗，将科学地评判作品优劣得失的神圣职能，跌落为评功摆好、庸俗吹捧；有的批评浮躁起哄，人为地制造热点，将引导创作健康发展、升华大众审美情操的社会责任，蜕变为随波逐流、浅尝辄止；有的批评东施效颦，或食古不化，或食洋不化，将东西方八面来风、生机勃勃的大好局面，损毁为不分良莠、削足适履；还有的批评也许是出于对过去极左思潮影响下那种动辄把文艺批评搞成大批判或无谓论争的行为，将健康的文艺批评也斥为棍子而加以排斥。于是，文艺批评的舞台看似热闹，常常是你未唱罢我就登场，但实则生命力不足，甚至丧失了鲜活灵动的生命之魂。

另外，“文艺不迎合观众迎合谁啊？”这种流行论调，未免失之轻率。乍一听，如果从“二为”方向之“为人民服务”的维度来理解，似乎说得过去，但实质上却是以“为人民”之名，行“伪人民”之实。这种迎合论，容易导致一些作品消极地适应当代观众中尚存的那种落后的审美心理和情趣。而这种消极地适应，无疑强化了有悖于现代化进程的落后的审美心理和情趣。于是，被强化了的这种审美心理和情趣，又进而反过来刺激创作者生产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更为低下的精神产品。这样，文艺的生产与消费之间部分地形成了一种“二律背反”式的恶性循环。

纵观历史,“花雅之争”古已有之,“普及与提高”更是时代命题。是让欣赏者“高攀”,还是让文艺创作与批评“低就”而丧失引领?这是任何一个文艺工作者都无法绕过的、需要慎重思考的问题。客观地说,欣赏者的审美品位并非整齐划一,但文艺创作应当防止“尾巴主义”,那种“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以“迎合”的形式来“为人民服务”的方式是十分错误的。如果文艺批评无视创作中对于一部分人的艳情化、娱乐化需求的一味迁就,那么,就是在纵容那些肤浅的作品让欣赏者止于养眼而有益于养心、止于视听快感而错失诗意美感,甚至是花眼乱心、败坏性情。批评家应该以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一双慧眼,辨析出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作品来引导人、塑造人、鼓舞人,这才是文艺批评“为人民立言”的正确选择。古今中外的经验反复证明:一切优秀的文艺作品都是既反映人民精神生活、又引领人民精神世界的。

文艺批评要有宏阔的哲学视野

失语,就是失去了生命力,失去了存在价值,失去了合法性。当然,批评家没有权力对文艺创作随便指手画脚,更没有权力强迫欣赏者选择“法定”的文艺作品,但这并不意味着批评家可以放弃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即引领文艺创作与鉴赏求真、求善、求美。文艺批评放弃了追求真善美的“失节”,就是“失语”的真正根源所在。

历史证明,一部优秀文艺作品的最佳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产生,即其价值的最终理想实现,不仅凭借作品自身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而且有赖于作品面世后批评家们辩证的哲理思辨及其指导下的科学的文艺批评。对作品做出实事求是、入木三分的科学评价,才能超越作品实现感性认识基础上的理性升华,也才能帮助欣赏者提高审美修养。读点哲学,悟点历史,懂点辩证法,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哲学管总,氛围养人。文艺批评要加强哲学关注,要提倡批评家从哲学思维层面考虑问题。文艺批评有了宏阔的哲学视野,就能够敬畏历史、珍惜今天、放眼未来,也才有可能重新赢得鲜活的批评生命力。

近年来,文艺创作上出现了“过度娱乐化”倾向,还被美其名曰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审美需要。这种现象看似有理有据、缘由复杂,但从哲学思维

层面深究，根子就是哲学思维的钝化甚至缺失，导致文艺创作在指导思想出了毛病。具体表现在文艺创作上，就是从过去一度忽视作品审美化艺术化程度的公式化概念化、忽视观众娱乐快感的说教化教条化的极端，跑到以视听感官的娱乐刺激冲淡甚至取代精神美感、以大制作大投入“营造视听奇观”的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的极端；从过去一度盛行的“高大全”式的伪浪漫主义形象塑造的极端，跑到“好人不好、坏人不坏”的“无是无非”、“非英雄化”的极端；从过去一度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排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极端，跑到违背唯物史观、失度讴歌帝王将相历史作用和把才子佳人当成审美表现的主要对象的极端；从过去一度把“人性”、“人道主义”列为创作禁区的极端，跑到以展示“人性恶的深度”和“窥人隐私”为“审丑”之能事的极端；从过去一度对传统经典敬若神明不敢越雷池半步的僵化极端，跑到专门逆向解构、颠覆传统经典以吸引眼球寻求“娱乐”的极端；从过去一度在历史题材创作中混淆历史思维与审美思维、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界限的极端，跑到随意解构历史、戏说历史、消费历史的另一极端。凡此种种都导向了“过度娱乐化”，都有悖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

文艺批评对此既不能居高临下、大话套话式的指责满天飞，也不应该取悦低俗、津津乐道于某些局部或细节的引人入胜，而是必须入情人理地进行总体分析。不仅要在捡起芝麻的同时不要丢了西瓜，而且要在珍惜美玉的同时不忘点明瑕疵。哲学通，一通百通；哲学思维“失之毫厘”，必然导致创作实践“谬以千里”。马克思说：“人类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文艺批评只有立足于哲学思维，才能够在“治本”的层面上根除“过度娱乐化”。

比如，影视艺术要有人文精神和历史内蕴的支撑。新世纪前十年的中国影视艺术，可以说是迅猛发展、生机勃勃。但是，没有质量的数量是没有意义的。艺术的价值，归根结底取决于质量。回顾过去的10年，影视艺术有一个趋向，就是视听快感冲淡乃至取代了精神美感。影视作品有一种离开哲学自觉，无限度地夸张视听语言营造“奇观”作用的倾向，缺少人文精神和历史内蕴。其实，偏离了刘勰在《文心雕龙》里倡导的“奇正”，就势必滑向“奇邪”。我们必须看到，这是理论思维的“失之毫厘”所带来的创作实践的“谬以千里”。我不赞成片面理解和追求观赏性。观赏性作为接受美学的范畴，虽然与作为创作美学范畴的思想性、艺术性有一定的联系，但仍主要取决于观众的人生阅历、文化修

养和审美情趣,以及作品与观众发生关系时的历史条件、文化环境和审美空间。这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变、因地而迁的。时代在变,引领这一代人的文艺作品,不可能成为引领下一代年轻人的全部精神食粮。但是,今天应该提倡什么,是一个必须慎重对待的问题。如果思想品位不高、文化内蕴稀薄、审美格调低下的影视作品持续作用于观众的鉴赏心理,势必营造出一种肤浅、浮躁、畸形、油滑的群体性审美定式。这对于提升中华民族的整体精神素质会带来负面影响。

优秀的影视作品,应该通过养眼,进而养心、怡神。有思想的艺术和有艺术的思想的和谐统一,才是艺术的“最高的标准”。有思想的艺术就是反对为艺术而艺术、艺术至上,有艺术的思想就是反对公式化、概念化。面对如此强势的影视媒介,影视批评的发展迫在眉睫。

21世纪影视艺术面对这样的挑战,这确实是当前迫切需要严肃思考的问题。

首先,不要惟票房或收视率。现在有一些影视作品缺思想、缺智慧、缺精神,单纯地信奉数字崇拜,这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一方面,对这些数字必须进行科学统计、辩证认识;另一方面,观赏质量的准则必须重视。艺术创作应当充分尊重并服务于观众——即使观众不总是对的,不考虑观众却总是错的。不过,这种尊重并非不加分析一味迁就、一味消极适应,这种服务并非顺从不健康、不文明的审美情趣。我们不能淡化甚至消解影视工作者传播民族文化的使命意识和责任意识,不能须臾忘却“重在引领”。

其次,不要轻易解构传统。我认为,改编应该在忠实于对原著的题旨和灵魂的正确理解,忠实于原著主要人物的精神气质和意蕴指向的同时,忠实于影视艺术所特有的审美规律,忠实于改编者自身的审美优势和个性。实践证明,对于深入人心代代相传的艺术典型、艺术观念,不是要逆势解构,而是要从顺势方向去深化丰富发展,要用新鲜的时代思维成果加固有生命力的价值观、加固优秀传统文化之根。解构经典、告别革命之类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要不得。我们要以一颗敬畏之心看待历史,看待优秀传统文化。

再次,不要陷入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单向思维。影视艺术要从审美思维出发,营造一种深刻而不肤浅、幽默而不油滑、沉稳而不浮躁的群体性鉴赏氛围。氛围是最养人的。这种氛围能够令人深入其中,不能自己地得到精神的滋润、灵魂的升华、素质的提升。这便是民族文化的软实力。

我不反对娱乐,健康适度的娱乐有益身心,但我反对恶俗过度的娱乐。像现在电视综艺娱乐节目就是失衡的,十多家电视台在炒作相亲,几十家电视台

在搞才艺比拼；电视剧产量过大、题材重复，一窝蜂地都是婆媳争斗、小两口吵架。如果承认电视节目承载着当代中华民族的大众审美趋向，那就要重视它的内容调控和方向指引。文艺创作应当充分尊重并服务于人民群众，但是，这种尊重并非不加分析一味迁就、一味消极适应，这种服务并非顺从不健康、不文明的审美情趣。我们不能淡化甚至消解文艺工作者传播民族文化的使命意识和责任意识，不能须臾忘却“重在引领”。

文化化人，艺术养心，重在引领，贵在自觉。这句话我已经说了十几年。文艺批评是激发文艺作品的引领作用、深化人民群众的文化自觉意识的最适宜的媒介。上升到哲学思维高度的文艺批评，不是跟在社会时尚潮流的后面做诠释性的工作，而是自觉站在社会思潮的前端，引领思想、艺术与技术有机结缘，攀登更高的艺术、思想高峰——揭示文艺作品独特的文化品格和美学个性，探寻文艺创作和鉴赏思潮的历史走向；揭露精神形态的“瘦肉精”、“毒奶粉”，敬畏自己民族的文化遗产，在历史观上寻求思想的甲冑。文化化人，教育育人，艺术养心，国泰民安。文不化人，教不育人，艺不养心，长此以往，国将不国。文化、艺术的主体都是人，关键也都在人，其积极价值都在于提高人的素质、提升人的精神境界。

有人说，上帝丢下了三个苹果，第一个被夏娃摘走了，于是造就了人类；第二个苹果落在牛顿头上，人类进入了机械时代；第三个苹果被乔布斯接到了，手机新媒体的时尚文化打开了新的时代大门。这样的联想与联系不无道理，也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在如何理解文化的重要性，以及怎样推动文化建设的认识层面，哲学意识的树立与灌注非常关键。乔布斯自己就说，他愿意用一生靠科学技术创造的财富，去交换与苏格拉底聊上半天。这足见其对哲学营养的珍视。哲学管总，是人类的智慧学。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科学的智慧学，也是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为人民立言”的文艺批评的灵魂。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社会生活日趋多样、多元、多变，各种思想观念相互交织、碰撞、激荡，民族的文化精神和审美范式正在重构的新的时代背景下，文艺界要为整个国家的政治稳定、人民团结、社会和谐营造舆论氛围和文化环境，就必须下功夫学懂弄通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充分吸取和借鉴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中至今仍有生命力的“天人合一”、“协和万邦”、“执其两端取法乎中”等兼容并包、辩证和谐的思维营养，追求健康的美感与卓越的思想启迪的和谐统一，尤其要从哲学层面上彻底摒弃那种简单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单向思